

前言：

要寫香港 FES 歷史是相當困難的，其中一項困難是可以找到的資料很多（無論是歷史文獻抑或是透過其他人的憶述），但已整理好的文章卻不多。以下的簡史只是一個相當粗疏的介紹，主要都是根據一些宣傳單張、通訊文章、年報及週年特刊拼湊而成。由於這篇文章是爲了新同工訓練下一個名爲「傳統與更新」的單元而寫，故此重點放在當時事工的特色及發展的路線上，人事變遷及更替則從略。故然人事變遷雖然對 FES 發展影響甚鉅，但筆者既無意亦無能力在此文章內交待。

成立初期（五十年代後期）

FES 成立於 1961 年，但若考究歷史，則可以追溯至 1957 年成立的三個組織，她們分別是畢業生團契（GCF）、福音閱覽室（ERR）及中學生團契（ISCF），而三個組織成立與當時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（IFES）遠東區第一任總幹事艾得理牧師（David Adeney）有關。當時 IFES 遠東區的辦事處設在香港，艾得理牧師自 1956 年來到香港以後，便積極聯絡當時的大學生及畢業生，與他們開組，並分享傳福音的異象。在艾得理牧師鼓勵下，本地及海外回來的畢業生組成「基督徒畢業生團契」。GCF 成立的目的，除了是幫助畢業生在崗位上作見證外，還包括用金錢的奉獻和禱告支持學生工作。

GCF 是當時學生工作的一股重要支柱。當時中學生福音工作，很多便是由 GCF 的成員推動，他們特別成立了委員會關顧中學生的福音工作。中學生的福音工作，其實是始於 1956 年 IFES 亞洲區巡迴幹事黃群健（Gwen Wong）姊妹來港。在港逗留兩個月期間，她聯同靈光堂的鄧鏗師母等，開始「中學生福音聚會（ISCF Rally）」，其後這些福音聚會由 GCF 接手。除了福音聚會外，GCF 更爲中學生舉行夏令會、訓練營，甚至在中學團契裡擔任導師、顧問，最後並且成立了中學生基督徒團契。

福音閱覽室的工作亦是在艾得理及 GCF 的推動下成立。當時他們認識到推廣優良基督教讀物的重要，於是在尖沙咀的德成街成立第一間的福音閱覽室。除了書籍借閱及售賣等服務外，不少福音活動及學生聚會亦是在閱覽室內舉行，閱覽室成爲當時學生工作的重要基地。

這段時間亦有另外兩個團體成立，他們分別是各學院基督徒團契（ICCF，71 年改名爲「專上學生福音團契」）及教師基督徒團契（TCF）。1957 年夏天，崇基、浸會、新亞及港大的同學聯合舉行了一次夏令會，這可以說是 ICCF 的開端。其後各院校團契不斷互相探訪，並一同舉行夏令會及聯校福音聚會，而 ICCF 最後在 1963 年正式成立。至於 TCF，則是由一群師範（即當時的教育學院）學生禱告開始。當時葛量鴻師範學院約四五十位基督徒每天均同心祈禱，將自己獻給主。他們畢業當上教師後，均在崗位上努力傳福音，並組織教師聚會彼此激勵。這些聚會吸引了其他師範畢業的教師參加。1960 年在 FES 首位同工陳喜謙協助下，教師聚會改組成爲 TCF，推動基督徒老師在崗位上見證耶穌基督。

FES 的成立，是由於整個學生工作的擴展，不同的團契覺得需要更密切的合作。於是各團契派出代表一同禱告及討論，並在 1961 年 10 月成立 FES。在 1963 年，IFES 在其第六屆代表大會中，接納香港 FES 爲會員團契。至於 FES 另一個會員團契-基督徒護士團契，則是在 1960 年成立，並在 1968 年初加入 FES。

這段時期因著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及韓戰的爆發，大批移民湧入香港，這令當時的香港社會產生重大的變化，人口劇增，輕工業日趨發達。由於難民的湧入，港府被迫與教會及其他志願團體合作，大力發展教育，而學校成爲一個廣大的福音禾場。隨著國內難民的遷入，49 年以前國內如火如荼的學生福音運動注入香港教會。當時國內學生福音運動是以培靈及佈道爲主，有很濃厚基要派的味。教育的迅速發展，靈性的復興，加上艾得理牧師的推動，掀起了當時學界一片澎湃的傳福音熱潮。FES 當時透過夏令

會、大型的佈道會、小組等，引領不少學生因而信主；而當時的講師、學生、老師及畢業生亦自發去作見證。這均為以後的學生福音運動的發展奠下基礎。

六十年代

六十年代是學生福音運動的發展及鞏固期。這段時間教會承接五十年代的佈道熱忱，更積極辦學，藉教育事業貢獻社會及傳福音。此時 FES 亦是延續五十年代的路線，側重於直接傳福音的工作，透過組織學生佈道會，帶領不少青年學生信主。由於 FES 本身是一個沒有宗派背景的機構，較少受傳統的限制，因此可以更自由及更有活力地摸索較新穎的傳福音概念及模式，例如福音營、福音性研經、友誼佈道等。另外，FES 亦開始提倡在佈道活動中安插民歌、土風舞、茶聚、旅行等青年學生喜愛的活動。在當時嚴肅保守的教會氣氛，這樣的安排是一大突破，而這些傳福音的模式，現今均為教會所接納及採用。

其次，FES 亦強調學生的參與及自發性，積極推動以學生為主導的學界福音運動。在 FES 的鼓勵下，在 1971 年 ISCF 之下設立「中學生議會」，而 ICCF 亦進行改組，設立聯校的議會。這些學生議會其中一個角色就是策劃並籌備聯校福音聚會及福音營。

在五六十年的教會，比較忽略正確的解經及有系統的研經。當時教會受基要主義影響，在取向上有點反智，認為著重理性會排除聖靈的工作。但當時的 FES 學生工作是剛剛相反，相當看重聖經的權威，積極推動歸納式研經、小組研經及組長訓練，目的是鼓勵學生深入研讀聖經，這對於當時教會研經的風氣有一定的影響。

除了查經外，當時的學生工作亦強調信仰的理性基礎，幫助學生面對信仰上的挑戰。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推廣屬靈書籍的閱讀上，當時所推介的作者有斯托得、高力富、李爾德、魯益師、巴克、薛華等，這方面工作對裝備學生建立穩實的信仰理性基礎是功不可抹的。

七十年代

這時 FES 的學生工作深受著本地校園及西方福音派教會內兩股大氣候所影響。

六六年開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所標榜的民族主義及理想主義，加上中國的乒乓外交和後來進入聯合國，還有七零年代初的保釣運動，不斷衝擊著香港青年的民族感情，新中國成為香港青年人的認同對象，大專校園興起了「認中關社」的熱潮。基督徒學生當時面對越來越多質詢，於是開始認真反省信仰對中國及香港社會的意義，並嘗試從理論層面回應馬列共產思想的挑戰。這些都是當時教會避而不談的課題，而 FES 同工則走在前線，與同學一同尋找出路，在過程中蘊生了不同的小組，有以文字回應，有著重探討向大陸傳福音實踐，而各院校亦紛紛成立「主愛中華」的祈禱小組。

至於西方福音派教會，經過 1974 年洛桑會議，對傳福音及社會責任的關係有了新的了解，為當時福音派的教會發展帶來新的動力。FES 亦在這個時候，肯定全人福音的重要，在鼓勵學生傳福音的同時，亦提醒他們對人應有的關心及尊重。這時有一些結合服務及宣教的行動模式出現，例如九龍灣安置區的康健中心及鄉鎮福音工作。此外，FES 同工更與學生一起思想如何回應社會事件，例如金禧事件、艇戶的需要等，而就金禧事件，FES 更聯同其他基督教團體發表聲明。

這段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「突破」的成立。當時蘇恩佩、蔡元雲、詹維明、梁永泰等人，為了回應當時青年人的需要，在 1973 年創辦了《突破》雜誌，其他「突破運動」的組成部份（例如影音中心、輔導中心、《突破少年》等），亦在其後數年相繼成立。當時「突破」的異象，是希望藉著文字及大眾傳媒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，表達基督徒的價值觀，挑戰青年人重建人生的方向。「突破」是本地及海外畢業生文化使命承擔的表現，象徵著 FES 在福音見證上另一個層次的發展。

這時期有另外兩項較為人忽略的事工發展，它們分別是海外宣教的推動及暑期全職事奉計劃，而這兩項事工均被視為宣教使命的實踐，前者的宣教工場是海外，後者則是本地。

1973年 IFES 舉行了「東亞區學生宣教大會」，當時不少香港學生亦有參與，之後更在所屬院校內成立宣教關懷小組。而在七十年代中以後，FES 與一些本地的差傳機構合作，舉行宣教營，加深同學對海外宣教的認識；除此以外，FES 亦籌辦了一些短期海外宣教學習團，主要是讓同學到東南亞地區作觀察、體驗及學習宣教的工作。在八十年代初，FES 與突破舉行了兩次賑災籌款的活動，一次是幫助柬埔寨難民（即 1980 年「救柬行動」），另一次則是針對中國大陸及東非的自然災害（1981 年「共負一轎」）。由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，FES 繼續籌備了一些海外宣教的活動（無論是講座、營會或短宣體驗）。

至於暑期全職事奉計劃，則是在 1979 年開始。在 1979 年上半年 FES 舉行了一個全職事奉的聚會，並在暑期安排有心全職事奉的同學，在六間本地福音機構內實習。這個計劃在以後數年均有舉辦，目的是讓同學體驗全職事奉的生涯，並幫助同學找尋上帝對自己的心意。而這項計劃到 1985 年後便沒有再舉辦（類似的事工，在 1999 年重新再辦，並以「一杯涼水」為名）。

八十年代

進入八十年代，九七問題引起香港社會極大的震盪，FES 率先組織聚會，發動信徒關注這個對香港和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契機。其後，FES 聯同其他多位教會領袖草擬了一份歷史性的《信念書》，向在社會及政治變遷中的香港信徒提出應該持守的共同信念。為配合《信念書》的出現，FES 出版了一系列的書籍（例如 1983 年出版的《1997：轉變與更新》及 1984 年出版的《信念書註釋》、）及查經資料（1984 年出版的《時代信念考查》），為學生和畢業生提供面對九七的反省與學習的機會；除此以外，FES 亦舉行了一系列的跟進研習班，探討香港的轉變、教會更新、基督徒的承擔、代議政制、民主、參政、國家觀、三自教會等，加深信徒對時局的認識，鼓勵他們繼續探索及投身。

除了關注九七的影響，FES 當時沒有忽略本地其他的問題，藉此而發動信徒對時局的關注。例如在 1986 與突破及基督徒守望社合辦「核電·社會·教會」，探討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事件；在 1987 年則先後兩次與突破聯合發起聲明及舉辦研討會，回應香港政府對公安條例的修訂和政制檢討的取向。FES 如此關注時局的發展，是相信基督徒的生命與使命是不能分割的，要具體見證福音，就必須首先認識處境，從而活出信仰。

1981 年六月，FES 轄下的出版部（主要是《突破》及《突破少年》）、影音中心及輔導中心正式脫離 FES，組成獨立的突破機構，與 FES 維持「姊妹機構」的關係。突破之所以獨立，主要是涉及路線及工作領域問題。當時 FES 除了上述三個部門外，還有學生部及福音閱覽室，前者是最直接進行學生福音工作的部門，後者則以閱讀推廣去輔助學生工作。至於出版部、影音中心及輔導中心，均是從《突破》雜誌拓展出來的部門，它們是以多種媒介打進社會的事工，而非單單以學校團契為基地，服侍對象亦非局限於學生；而且它們的工作性質是屬於福音預工多於直接佈道。建議將兩個機構分開，是相信這樣安排對兩個機構都會有裨益：FES 可以保持更鮮明的學生工作路線，而突破則可以在出版、影音及輔導上繼續新的拓展。

與突破分開後，FES 重新反省自己的事工重點，最後確定以「使人作門徒」為事工的核心。根據當時同工對福音書的反省，耶穌整個使命的核心是「使人作門徒」（見太廿八 19-20）；而耶穌的主要工作則是走到群眾當中，藉著宣講天國的福音、教導天國的道理，並醫治疾病的「三重職事」，在群眾中呼召人跟隨祂。在這個意義下福音工作的目的，不再單單是局限使人決志，而是使人跟隨主作門徒。至於福音活動，不單是傳遞一套救贖的概念，而是把福音直接引進受眾的生活當中，與學生一同面對時下影響他們的問題，探討福音對他們的意義，從而委身跟隨主。當時福音活動觸及過的主題有：家庭、學業、自我形象、同輩關係、戀愛、電視、電影、流行曲、選美等。這樣的安排，除了是代表對學生切身問題的關心外，亦希望同學過與福音相稱的生活，作委身基督的門徒。

「使人作門徒」除了影響佈道的模式，亦衍生了「門徒學習計劃」。當時同工認為耶穌基督的門訓

工作，是包括普及與深入（或深度與闊度）兩個層面。普及層面的工作就例如宣講、教導及醫治等工作，耶穌透過這些工作可以接觸到無數的群眾；但同時耶穌亦從眾多的跟從者中揀選一些門徒作深入的栽培，使他們繼續承擔天國的使命，肩負使人作門徒的工作。FES 當時的事工亦採取類似的模式，一些大型的聚會例如「救束行動」、福音營、門徒訓練營等是普及的工作，而同工與中學生、大專生、畢業生、教師及義工（例如《中學生月刊》的編委或福音營的籌委）等開小組（主要是門徒學習小組）則是深入的工作。這些門徒訓練工作是希望某些接觸 FES 可以得到深度、整全的靈命造就。當時門徒學習小組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，分別是對神的委身、門徒的生活方式及使命的承擔。根據當時年報的記載，每年同工所開設的小組約十數個，所接觸到的人有百多人。這些小組不單造就了不少學生及畢業生的生命，亦為 FES 帶來一批有質素的義工，間接幫助事工的推行。

這段時間另一個較大的發展是文字工作。FES 當時不少的出版是跟整體事工配合，例如《1997：轉變與更新》、《信念書註釋》及《時代信念考查》等是配合對九七的關注，《爾國爾城》、《和平的福音》及《服侍這一代》則是配合使命的承擔。還有一些書籍是整理前線同工的經驗，例如《再見團契》是探討團契模式的更新，《又真又活傳福音》則是對傳福音的反省。這段時間出版與前線的配合是相當緊密的。而另一個發展得較佳的事工是閱讀推廣。承接七十年代末的「平衡讀書計劃」，福音閱覽室繼續推行此計劃，而每次參與人數均有數百人，而其後又推出「穿梭少年閱讀運動」、「一傳一閱讀運動」、「息息不斷讀書計劃」、「更新導向讀書計劃」等不同的閱讀計劃。此期間福音閱覽室亦籌辦了不少閱讀活動，例如讀書生活營及讀書小組，並出版《書蕊》及《書評》推介好書。

在八十年代初至中期，FES 的事工是發展得相當蓬勃，可惜至後期因為人事流動比較多，某些部門甚至出現人手短缺（例如 89 年大專部只有兩個半同工），影響了事工延續及發展。

九十年代

八九年中國爆發學運，同學對祖國的熱誠再次被挑起，不少基督徒同學曾熱烈參與支持國內民運的行動，FES 同工更是全力以赴。FES 當時與突破合作，舉辦「中港青年一條心」集會，共有二十萬人參與。之後為了幫助同學面對中國民運事件，FES 一連舉行了三次「學運·學習」的講座，重點讓同學認識中國現況，並作出信仰的反省，講座後成立跟進小組。翌年十月，FES 再舉辦「信仰救國」的研討會，探討基督徒對國家的回應，目的亦是鼓勵同學認真關注中國，並思考如何裝備自己回應國家需要。

雖然當時 FES 舉辦了不少回應時局的活動，但同學的使命感卻未被引發出來。在八九民運過後，因著六四的慘痛回憶，加上中英港不安的形勢，不少學生落入失落及迷惘中，對社關國難等感無力承擔；其次，不少同學亦發現自己內在生命枯乾及空洞，故此由 89-92 期間，大專團契開始注重內在生命的操練，希望在一些基本的屬靈操練中重新與神及人復和，建立關係。當時大專同學花很長時間安靜、祈禱、默想聖經，並不時舉辦靜修營作休息及內省。此外，他們在這三年間舉辦了不少大型的聯校佈道會及夏令會，同學的反應亦相當熱烈。這段時期的同學所關心是自己內在的生命，除了對校園福音有一定承擔外，一般對時代使命的觸覺是明顯下降。這個情況因著 FES 內部人事變遷，以及九七的臨近，自九二年過後開始有改變。

首先是對思想戰線的重拾，這某程度上對九零年初屬靈操練熱潮的反動。當時大專同學不再像以前一代般習慣枯燥的理性討論，喜愛較為感性的屬靈經歷，面對其他學科或思潮對信仰的挑戰都無力回應。為了幫助同學能重新建立信仰理性的基礎，以及回應思潮文化對信仰的挑戰，FES 舉辦了一系列的護教講座，例如「基督知識份子回應當代思潮的挑戰」、「苦難：信仰的盡頭」、「基督教：貧乏？豐盛」及「福音睇真 DD：信仰難題探討」、「曲直是非同性戀講座」等，這些講座大部份是由當時訓練部主任關啓文主講，每次的參與人數均達數百人。除了大型的公開講座外，訓練部亦有一些深入的事工，例如在 94 至 96 連續三年的暑假，均辦有一些密集神學課程，目的亦是幫助同學反省信仰與時代議題（例如

人權、性、社會關懷、中國等)的關係。

其次是則是使命的承擔，尤其是培養同學對時代感召的回應能力。這方面的實踐主要有兩方面，一方面是對本地的關懷，另一方面則是迎接九七回歸中國。本地的關懷主要有關注色情文化的工作。在94年訓練部舉行了「門徒與當代世界」的暑假神學課程，其中一個小組是探討轉變中的香港性觀念，這個小組有感於在香港社會中黃潮泛濫，於是成立「基督徒關注色情文化小組」，組織行動喚起社會各界對這問題的關注，而這個小組最後衍生了現時的明光社。

至於迎接九七、回歸中國方面，FES 是努力不懈，積極幫助學生作好準備，承擔回歸後的挑戰。在93至96年間的一連串的大型集會，均是以此為主題，例如93年有二月「根出於乾地：政權轉變下生命見證」(FES Day 講座)和十一月「齊上路·迎九七」(35週年公開論壇，探討中國教育、青年政策、及教會預備青年回歸等)；94年則有一月的「基督徒知識份子對香港及中國的使命承擔」(FES Day 講座)、二月「活在大時代·傾出中國心」(ICCF 講座)、七月的「走那不知道的路：大專及畢業生使命承擔營」以及十至十二月為期四次的「關心中國系列」；95年的二月「同行天國路·共渡選舉年」講座；96年二月的「中國節」(ICCF 活動)，以及六月的「政教關係」講座。其次，自1994年起，ICCF 每年暑假均舉辦「中國行」，讓同學有親身體驗並了解國內的情況，而院校團契內亦紛紛設立「關中」小組。在那些日子，回歸及中國成了聯校及 FES 活動的主題。

後話

從上述的內容，不難發展 FES 是循以下幾條主線發展：研經、門徒訓練、信仰反省、使命承擔（包括本地及海外宣教）及回應時代等。當然筆者並沒有在每個年代中交代各主線的發展，但這不代表該主線在那些年日毫無發展。以海外宣教為例，在七十年代後均有不少活動，只是這些活動的規模通常是較為小，亦沒有成為當時主流。至於研經，FES 是一直致力推廣，亦在這四十年間不斷訓練學生，只是筆者沒有詳細考究及交代有關的發展。不過，筆者相信，透過上述的記載，讀者能對 FES 的發展，以至我們的核心工作，能有一個概括的掌握。